



【畅论国事】

青年导师李开复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路上,会自觉不自觉地给社会和公众挖坑。

高国玺

李开复近日公开演讲时对听众说:买汽车是你最失败的投资。这一言论引发热议。

这个世界上有谁把购买自用汽车当做投资了?谁曾想过自己买的汽车开过几年以后再卖出去,还能有年化百分之几的回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有人把购买某种消费品说成投资来跟你套近乎,你十有八九会想这是传销。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李开复博士没做传销。那么为什么像李开复这样爱惜羽毛的投资大咖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把购买自用汽车的消费行为说成投资?因为青年导师李开复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路上,会自觉不自觉地给社会和公众挖坑。

为了推广自己重点投资的人工智能、共享汽车之类,李开复博士寻找各

种角度为之站台、吆喝,这本无可厚非。或许他的本意也仅止于此,但他为此是不遗余力的,不留神就跨过了基本底线,践踏常识,愚弄听众,把家庭购置汽车这一消费行为说成投资了。

李想迅速站出来怼了李开复:没必要通过贬低一个大群体的选择来抢占话题热点。而他之所以极力反驳李开复,恐怕是因为李想目前所做的“车和家”主要是造车卖车,李开复的言论触动了李想的蛋糕。

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哪个大咖站出来,为李开复混淆常识、混淆视听、把家庭购车说成投资而发声。

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可能会发现类似的戏码时常在上演。作为一直很重视自己形象、爱惜自己羽毛的青年导师,李开复博士尚且会偶尔爆出这样的“金句”,其他在追求名利之路上狂奔的大咖就更不用说了。所以

笔者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苛求其一字一句的表达,而是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人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路上,会自觉不自觉地给社会和其他人带来伤害,有的是物质上的,有的是心智上的。咖越大,可能破坏性越强。

曾几何时,贾跃亭对自己理想的描绘和追逐也曾令亿万人动容。包括另一位青年导师俞敏洪在乐视崩盘后依然表示,他数次在现场听过贾跃亭演讲,确实挺感动的,但俞老师人生经验丰富,止步于内心的感动,有些人则真金白银的投资进去,最终贾跃亭的理想成了不少人的梦魇。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宜拿贾跃亭与李开复相比,但是能够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而把购买自用汽车说成投资的李开复,与贾氏却显得有几分异曲同工。

作为一个尚在风险投资之路上摸索的“无名之辈”,笔者斗胆拿李开复

博士说事,既因有感于类似问题的普遍性,也是一种自警,避免“最终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风险/股权投资行业里,许多人没能“成为自己讨厌的人”,而最终成功地“成为自己讨厌的人”的也不乏其人。

写财经评论是笔者的业余爱好。虽是爱好,在社会上也是一个行当。笼统地说,以专业姿态发声、影响公众认知的行当里,也大量存在为了自己的名利而践踏常识、伤害大众心智的现象。

多年来一直有专家在预测股市的顶部、底部和股指的点数,尽管证监会主席曾公开批评过预测股指指点的行为,但这类预测仍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还精确到个位数。这类猜测式的缺乏逻辑基础的“精准预测”,一旦预测(猜测)不准,专家就不再提此事;一旦说中了,就成了可以反复宣传的得意之作。

预测指数是误人的神通。另有些

专家,玩的是无用的大实话。比如近期某金牌分析师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过度超跌的市场一定值得投资。专访文章即以这一金句做标题。看似很有哲理的金句其实是无用的大实话。为了把这句话彻底夯实,该金牌分析师不惜口出偏句,“超跌”之上再加“过度”。具体时点的具体个股,什么股价算“超跌”?什么股价算“过度超跌”?许多人本已感慨,听过许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奈何我们的专家依然在不遗余力地输出无用的道理。

“财经毒舌”叶檀前两年开始创业,做财经领域知识付费,以“聪明人在一起说人话”为口号。笔者初始时感觉“说人话”的提法有点low,但从上述种种专家公知之怪现状中,深深感到,“人话”或许真是我们迫切而广泛需要的。

(作者系章和投资管理合伙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日本“零元售房”,我国三四线楼市会步后尘吗?

李宇嘉

2009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底特律的房子“一元售卖”。当时有报道,国内有人去美国“抄底”。后来发现,这是个玫瑰陷阱,“一元房”背后是个巨大的债务黑洞,比如几千美元的修缮费用,老业主欠下的数千美元房产税等着偿还,街四四的小偷正窥视你(犯罪率攀升了200%)。近期,日本爆出“零元售房”,与底特律产业衰败和人口外流导致“一元房”比,地少人多、高山密集的日本出现“零元房”,与老龄化、大城市化和年轻人对房子的“佛系态度”有关。

日本的大城市化、都市圈化,在全球最显著,集中在关西和关东的日本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名古屋),占

了全国人口的70%和GDP的70%。特别是日本大东京圈,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一点,集中了近29%的日本人口,生产了30%以上的GDP。日本广大的其他地区(九州岛、东北地区和北海道等),人口越来越稀疏,房屋空置率也越来越高。近年来,日本房屋高空置率就备受国际关注,日本Fujitsu研究所报告显示,2013年日本有820万个空置房,空置率达13.5%。按照现有的趋势发展,到2033年,考虑新拆除住宅后,日本住房空置率将达到22.8%。这意味着每100套房子中,就有20多套空着,租也租不出去。

90年代初的地产危机、股市崩盘,以及随后20多年的经济衰退、房价和股价下跌,30岁左右的年轻人亲眼目睹。再加上,现在育儿及养老压

力、工作压力都很大,结婚、生子购房,年轻人的这三大欲望开始衰减。相应地,日本也不会出现类似中国的“二胎热”、返乡置业热。于是,随着人口由乡入城、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空置房屋从乡镇蔓延到小城市。据预测,2053年日本人口将跌破1亿、老龄化率为40%,2060年人口降至8800万,如若此,空置率有增无减。

国内热衷于研究日本的楼市问题,一则两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国民努力上进,二则日本经历了一轮完整的由盛转衰的地产周期。目前,中国楼市泡沫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预期甚嚣尘上,同时也正在经历老龄化、大城市化。2015-2017年,我国600多个三四五线城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楼市繁荣,房价都上台阶,单价万元以下的城

市很少了。兴业证券研究显示,2016-2017年,按揭贷款的50%、消费贷款的60%流向了三四五线城市,而支撑楼市的人口和产业却不为看好。

目前,我国大城市化如火如荼,点状增长正在成为经济新引擎。无论从人口流向、或政策导向,大城市已成为新增增长极。目前,我国13个城市人口超1000万,各省还在在举全力建设“强省会城市”,预计未来将有30个千万级的城市;同时,人口千万的城市,就业吸纳力强的第三产业或现代服务业占主导,年轻人恋土情节淡,更钟爱大城市。近年来,乡镇空心化,三四线城市人口外流已显现。那么,这些城市是不是也要经历类似日本的高空置率和厄运呢?

我国与日本最大差别,就是发展

极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差距。近年来,国家铺设了一张大网(道路、互联网、电信),城乡互联互通,开阔眼界的村组和乡镇村民,已是三四线城市人口的新生力量,进城买房是农村结婚“新三大件”。未来,农村还将转移2亿人口,相当于日本人口的170%,很大一部分会就近到三四线城市,包括陪读、就业、养老,楼市也将呈现软着陆走势。就空心化的村组和乡镇,国家已启动村村合并、复兴生态、观光农业等美丽乡村行动,不会出现土地私有制下,任由房屋衰败而无法纠偏的现象。未来,三四线楼市可能会大面积空置,这无不妥,空间结构本该随人口流动而调整,只要人居和环境协调即可,就像淘汰的产业一样。

(作者系资深地产研究人士)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制度性安排来推动

储著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近日发布,它绘就了今后一段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路线图,到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显著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其中原因有很多方面,如自然环境差异、历史文化差异、制度差异以及交通条件差异等。这些差异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我国社会发展目标是不相符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当一部分地区已先富起来后,如何驱动其它地区也跟着富起来,就成了一项重大现实性课题。区域的平衡

发展不能依靠阻止或延缓先进地区的发展来实现,而只能依靠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来实现。

就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加快其发展,就必须从其形成原因着手。这些原因有些是人们无法随便改变的,如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我们只能顺应而不能轻易去挑战。过去,我们做了不少“人定胜天”的事情,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从长期来看,最后常常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当然,人们在自然环境面前也并非无所作为。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一方面不断改善环境,另一方面根据环境的特点来确定合适的发展路径与战略。

影响区域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则是可变的,如交通条件、制度安排等。这才是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发力的地

方。我们现在有不少区域性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都是为了推动某一区域的发展而制定的,都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引导资源的流向。有了制度的扶持,实际上也就有了资源的扶持。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所有政府主导的战略、规定、体制与机制等。中共中央国务院最新提出的“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制度性安排。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总的体量上来看,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是从国内具体布局来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却非常突出。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行

业、不同部门之间,也表现在不同区域之间。随着先进地区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种不平衡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近年来中央政府才先后出台多种举措来尽力阻止或减缓这一趋势。其中一项战略就是精准扶贫。

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靠简单的帮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彻底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政策的指引,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其从产业上进行变革或升级。比如,多山的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政府数据显示,贵州3500万人中有400多万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2015年,中央宣布将贵州建成发展大数据的“国家级试验区”。受此带动,仅仅几年贵州大数据公司就增长到8500多

家,是2013年刚起步时的8倍多。中央之所以做此决定,是因为贵州有很好的理由充当“大机房”,这里的地价比沿海便宜;得益于当地的水力发电,加上地处由西向东输送电力的干线上,电力成本也更低;此外,贵州的气候也比南部沿海城市温和,更易于让服务器保持在较低的温度。可见,扶持政策必须密切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效果来。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对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做了很多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它还设定了2035年这一时间表。希望各方拿出勇气胆识、智慧与魄力,积极行动起来,早日让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办法总比困难多

木木

车行路上路难走,在许多地方,几乎成了常态,这既有车多的原因,也有管理手段落后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规驾驶的人太多。

比如吧,路前方的半空中高悬了专抓违章的摄像头,绝大多数正舒心情畅脚速行驶的车辆,一般都会本能地抢着变成“规矩人”;走在错误车道上的,立刻往“正道”上挤;超速行驶的,赶紧一脚刹车踩下去……这也可以理解,被摄像头“盯一眼”,实在是罚钱事小、扣分事大。

摄像头,还是有讲究的。那种连个缝、灯也不打就别人车道里硬挤,

或者一脚就把车恨不得“踩死”的,一般都是“粗人”,因为总顾着自己合适,不管他人死活,所以特别招人恨。当然也有“形粗实细”的,或艺高人胆大,早就估好了“量”,瞬息间就把一切搞定;或心思缜密,吃定对方得让着自己,而有恃无恐。还有一种就比较“狡猾”,远远看见摄像头,先把车速降下来,然后打着灯,规规矩矩往前蹭着找机会,逮着机会迅速“入轨”,绝不影响后车,有格外绅士的,还会从车窗里挑出一根大拇指给后车,以示感谢呢。

这种“钻空子”行为,确实给监管者出了难题。不管吧,一是说不过去,怕惹来尸位素餐的帽子,二是怕引起“破窗效应”,交通被搞得一团糟。管

吧,似乎还真真是没啥好办法。多加一些摄像头,搞成“天网式”无缝监控?成本实在有点高,而且城市形象也不好。把摄像头藏在暗处偷拍?偷偷摸摸的,太不光明正大,有损监管者形象。不增加摄像头,只加大处罚力度,逮住就罚他个“倾家荡产”?好像也不太合适。

看似无解,但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肯琢磨,天大的困难也有克服的办法,不肯琢磨,再小的困难也能难死人。

如果把整个交通系统看成一个“市场”,整天开车在路上跑的司机,无疑就是这个“市场”的参与主体。既然拥有了主体地位,那么,维护“市场”的稳定、健康运转,就是每一个主体天然

的责任。违章者危害了“市场”的稳定和健康,主体当然就有责任对违章者进行“监管”。

这种“主体监管”,在现有技术手段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几乎每车必备的行车记录仪,完全能做到“主体监管”无死角;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行车记录仪甚至还能自动上传违章记录,根本用不着“主体”费事。在监管逻辑上,也没问题。为了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守法者的利益、整个“市场”的利益,对违章者出手阻止,这种带有“自治”色彩的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能理直气壮。

虽然从哪个角度讲都没问题,但不可否认,这种“主体监管”天生就有

“软骨病”,要想使之尽快硬起来,除了要大张旗鼓地正名、推动外,当然还要辅之以足够的利益激励,比如,完全可以把违规者的200元罚款,直接打到行使了监管权的主体的账户里。一罚一奖,各得其所,规则简明,成本可控,治病救人,目的良善;现有的监管成本肯定会大幅降低,整个“市场”的秩序,也能随之迅速改善。

类似的办法,只要想,总能想出不少吧;类似的办法,这个“市场”能用,别的市场没准儿也好使。这个信心一定要有的,毕竟,人就是这样想出一个又一个办法,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而走到今天的。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环宇杂谈】

我国与日本最大差别,就是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差距。



【潜河流韵】

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引导资源的流向。有了制度的扶持,实际上也就有了资源的扶持。



【缘木求鱼】

人就是想出一个又一个办法,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而走到今天的。